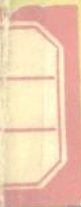


清代宮史探微

清代宮史研究會 編



紫禁城出版社

第一届清代宫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清代宫史探微

朱家溍題

清代宫史研究会 编
紫禁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栾静莉

封面设计：郑志标

清 代 宫 史 探 微

清代宫史研究会编

•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8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80047-117-9/K·46

定价：11.00元

目 录

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	朱金甫 (1)
军机处初设时间新征·····	俞炳坤 (25)
简论清初十三衙门·····	李鸿彬 (41)
十三衙门初探·····	江 桥 (49)
清代上驷院综谈·····	张 莉 (57)
清初宫廷礼仪琐谈·····	王佩环 (67)
清朝入关前宫廷制度的演变·····	佟 悦 (82)
清前期的卤簿仪制·····	刘文娜 邓 庆 (98)
清帝祭陵礼仪略考·····	晏子有 (106)
清代陵寝規制初探·····	徐广源 (118)
试论弘历的经济政策思想·····	万 依 (137)
从人参专采专卖看清宫廷的特供保障·····	叶志如 (164)
清宫御用三大丝织中心简述·····	张淑贤 (190)
清代宫中出现西方文化的原因探讨·····	刘 潞 刘月芳 (199)
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	杨玉良 (213)
清帝东巡与宫廷音乐·····	张东升 (238)
五行·四象·三垣·二极——紫禁城·····	姜舜源 (251)
故宫雨花阁探源·····	王家鹏 (261)
清代宫苑的乾隆建筑风格·····	傅清远 (280)
紫禁城的亭子·····	茹竞华 (288)
试析北京故宫东西六宫的平面布局·····	周苏琴 (299)
清代宫廷的警卫制度·····	秦国经 (308)
清宫兵器研究·····	胡建中 (326)

沈阳故宫藏牙雕诸天法像龕与喇嘛教·····	吕霁红 (342)
东珠——清王朝皇权的象征·····	张淑芝 (352)
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	李英华 (361)
论乾隆时期清宫节庆活动·····	苑洪琪 (369)
有关乾隆帝东巡盛京的两个问题·····	姜相顺 (384)
简述嘉庆十年巡幸盛京耗资概况·····	陆海英 (403)
康熙与昭莫多之战·····	袁森坡 (413)
雍正朝臣工缮缴面谕考·····	李国荣 (431)
雍正赏赐衙署和臣工匾额漫议·····	刘桂林 (440)
王昶扈从弘历北巡热河纪事诗琐议·····	稷 若 (451)
慈禧当政不是为了覆灭满洲·····	徐 彻 (460)

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

朱金甫

清王朝沿入关前的惯例，将儒臣在内廷的直庐，即办事处所，称作“书房”^①。入关后的清代宫廷之内，先后有过两个书房，一称“上书房”，一称“南书房”。前者是皇子们受师傅教导之所，后者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内廷翰林的值班办事之处。这两个书房都有它们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均曾在清王朝的政治活动中起过不同的作用。尤以康熙时期的南书房，不仅令当时的朝臣们十分瞩目，而且还引起后世治史者们的关注。然而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至今对康熙时期南书房活动的内容及其政治作用和地位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因此认识也不甚一致。近年以来，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起居注》的公布及《南书房记注》^②的发现，为康熙时期南书房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资料，为此笔者不揣识见之寡陋，爰以此文，略抒管见。

一

南书房，作为内廷翰林侍值之所，始于康熙朝，这已为多数清史学者所公认，极少异议。但在涉及其设立的具体年月时，各种记载则略有参差。如《养吉斋丛录》载：“康熙庚戌，一甲一名蔡启傅、二名孙在丰、三名徐乾学，于是年十二月召对弘德殿，赋诗，命同值南书房”^③。康熙庚戌年，即康熙九年（1670年）。

《清史稿·沈荃传》载：沈荃于康熙“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④。而《郎潜纪闻初笔》则载康熙“十六年始立南书房”^⑤。考之清《圣祖实录》及《康熙起居注》，南书房设立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应是确定无疑的，其中以《康熙起居注》的记载最为详细。先是，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清圣祖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曰：“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城外，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今着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着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内阁大学士、学士们随即遵旨会议后奏：“皇上勤学书写，甚盛事也，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可也”。清圣祖随即表示“依议”^⑥。此事经内阁大臣们会同翰林院多日选择和会议讨论，将名单进呈，清圣祖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正式谕令内阁：“著将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著食正四品俸。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著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着交与内务府拨给”。又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尔等传谕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伊等俱系读书之人，此等缘由虽然明知，着仍恪遵朕谕行”^⑦。自此，张英、高士奇二人即入侍内廷，并赐第于瀛台之西的西安门内。在此以前，清王朝的文学儒臣无居住皇城内之例。至于张、高二人在内廷的侍值地点，在上述谕旨中虽未明确指出是在南书房，但作为有关南书房史事的第一手资料——《南书房记注》，则明确记载：“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命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支正四品俸臣张英，内阁撰文中书、支正六品俸臣高士奇，于南书房侍从”^⑧。可见张英、高士奇入侍内廷之

日，即是南书房作为一个内廷机构的正式设立之时。《南书房记注》开始的时间，比《康熙起居注》所载早一天，说明清圣祖是先命张、高二人入值南书房，第二天才正式谕知内阁的。所以，南书房的设立时间，应为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前引《养吉斋丛录》及《清史稿·沈荃传》所载均有误。尤其是《养吉斋丛录》所谓康熙九年科举殿试一甲三名蔡启傅、孙在丰、徐乾学同日召对弘德殿，同日入值南书房之事大有出入，是科一甲三名确为蔡、孙、徐三人，同日召对弘德殿或许有之，但同日入值南书房则无其事。而且蔡、孙二人从未见有入值南书房的记载，徐乾学入值南书房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之后。至于《清史稿》所载沈荃于康熙十年（1671年）入值南书房，考之《清碑传集》内沈荃“墓志铭”（王熙撰）、“沈荃传”（王昶撰）以及沈荃“神道碑”（邵长蘅撰），均无此项记载。康熙九年，沈荃因其书法著名而被召内用，这是事实，而且从此经常被召入内廷，“或命就御榻前濡墨挥毫，或颁宫纸令缮写卷册以进。日或一再召见，见辄赐茶或赐坐，上或自作大书令题。其后所赐御书风管、裘蹄貂裘、文绮茗饌之属，至不可胜记”^⑨。但这并不等于就是入值南书房，因为早在南书房设立之前，清代历朝皇帝都有召儒臣入值的惯例。如“天聪二年清太宗命儒臣分直文馆，顺治十年清世祖命内院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内更番入直”^⑩。高士奇在入南书房前，亦早因擅长书法而“由监生充书写序班，供奉内廷”。但在南书房设立之前由儒臣供奉内廷却无定制，因为第一没有正式名义，不是专职，只是临时性的应召入内，事毕即退出；第二更无赐第禁城之内，早晚都需在內供奉之例。赐第禁城之内，这是南书房翰林的一种特殊待遇，一旦被解除南书房翰林之职，就要迁出禁城。如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年入值南书房，赐宅景山之北黄瓦门东南，一年后被劾落职左谪，则仍迁回宣武门外旧居^⑪；第三，尽管南书房作为当时皇宫中的一处建筑，早就存在，而且是

清圣祖旧日读书之处，但只是到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它被清圣祖指定为入内侍值的文学词臣的办事处所之后，才作为一个内廷的机构名称而载入史籍。所以沈荃虽早在康熙十六年以前就入召内廷，并不能证明当时就有南书房之设。康熙十六年四月初十日的起居注内有一条记载云：“初十日丙辰……上御弘德殿，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进讲……。讲毕，上谕喇沙里：‘尔可同詹事沈荃于乾清门候召’。少顷，传入懋勤殿，命荃书‘忠孝’二大字及‘正大光明’四字行书一幅。上览毕，复亲书‘忠孝’二大字。喇沙里等出，赐茶。又传谕沈荃：‘尔在御前作书，未免拘束，可于私寓写大小字数张进呈，朕将览焉’”^② 这里没有提及南书房之处。沈荃其时的正式官职是詹事府詹事兼充日讲起居注官，属天子近臣，但并非常年在内廷侍值，有事召入时，是在乾清门等候，事毕即退，这与以后的南书房翰林有明显的区别。

二

南书房在紫禁城内乾清宫南庑的最西端，亦称南斋，属内廷范围。室宽三楹，因是清世祖及圣祖旧日读书及活动场所，室内设有御座。张英、高士奇应召入内后，每日即于此处等候清圣祖召见或处理其交办的事宜。《郎潜纪闻二笔》内有：“大内南书房后院壁，有世祖皇帝幼年习弹痕迹。又桐城张文端、静海励文端（恪）二公，在南书房，每入值，于阮（按阮、坑、炕三字，皆无床榻义，今北人习呼卧榻为阮，故鲍氏沿用之）边坐处，以辨发抵壁，久而发印渍纸，至今尚存。见长兴鲍氏《亚谷丛书》”^③。张文端即张英，励文恪即励杜讷，都是最早入值南书房而且历时甚长的著名儒臣，南斋壁纸留有他们的发渍，或有可能。又皇帝驻苑时，南书房入值词臣例亦随从，故皇家禁苑之内也设有南书房办事处所。圆明园的南书房值庐，最初在园内东如意门外，后于园内勤政殿东垣赐屋三楹^④。这些都是乾嘉以后之

事。清圣祖晚年常驻畅春园，该处亦应有南书房值庐，可惜笔者未见记载。

凡被召入南书房，时称“人直南书房”，或称“人侍内廷”。其入值者，不论出身资历，概称“南书房翰林”，也称“南书房供奉”、“内廷供奉”^⑤或“南斋侍从”^⑥。故朱彝尊在入值南书房后，有“本作渔樵侣，翻联侍从臣。迂疏人事减，出入主恩频”之诗^⑦。凡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均是文学儒臣，而且顾名思义，既称“南书房翰林”，其人员的来源，自然是以翰詹官员为主。据已知的34名康熙朝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中，原任翰林院编修、检讨及詹事府官职者有23人。即张英、陈廷敬、叶方蔼、沈荃、朱彝尊、徐乾学、王鸿绪、陈元龙、彭廷训、励廷仪、张廷玉、陆隼、杨名时、汪灏、杜诏、何国宗、梅穀成、张廷璐、胡煦、窦克勤、戴梓、沈敬宗、法海等。高士奇及励杜讷虽非翰林官，但高在入值前已任詹事府录事，励也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即因书法知名而入实录馆缮录《世祖实录》，所接触的大都为翰詹官员，康熙十一年《世祖实录》成书后叙劳授福建福宁州同，但并未到任，依然在内廷供奉。当然，清圣祖之所以要设立南书房，主要是为其读书学习提供切磋咨询之便，因此其选用南书房翰林，并不仅限于翰詹官员，凡被他认为有真才实学或有一技之长者，往往不论出身资历，均可能被召入值。如王士禛、张伯行是两榜出身而未经馆选，历任部曹或地方大吏，惟因张由理学而名重一时，王因博学善诗著名，均先后被召入值南书房。其他如钱名世、查慎行、魏廷珍、蒋廷锡、汪灏、贾国维等人，则以举人身份入充南书房翰林，王兰生、何焯更以生员身份，由李光地荐入南书房。尤其是桐城举人方苞，因戴名世文字案牵连入狱，竟因其文学优长，为清圣祖所素知，免罪隶旗后，亦经李光地荐入南书房。总之，在康熙之世，因清圣祖雅好读书，留心翰墨，故先后入值南书房的翰林，绝大多数人无论文章道德，可谓一时

人望。其中以张英、高士奇、励杜讷、陈元龙等人的入值时间为最长。张英是安徽桐城人，自康熙十六年入值南书房后，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升任大学士时为止，除因葬父请假归里四年外，在南书房侍值几达二十年，日夕为清圣祖讲论经史治道，对清圣祖影响最大。高士奇是浙江钱塘人，与张英同时进入南书房，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终养其母归里为止，其中除有五年的时间曾被劾休致外，先后任内廷供奉十五年左右。他于经史书画无不精通，清圣祖曾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⑧。励杜讷是直隶静海人，康熙十七年入值南书房，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去世为止，侍值内廷几达二十五年，历时最长，但影响不如张、高二人。陈元龙为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第二名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因工于书法受知于清圣祖，先后充任内廷翰林二十余年。

张英致仕后，其子张廷玉、张廷璐，也先后被清圣祖召入南书房。在康熙朝父子相继入值南书房者，还有励杜讷、励廷仪父子（励廷仪之子励宗万在雍正二年也入值南书房），沈荃、沈宗敬父子等，这在当时，可谓是令人十分羡慕的殊荣。

南书房虽然是内廷的一个机构，但并未列入国家或内府的正式编制，实际上只是一个外朝词臣在内廷的值班房，其入值人员的禄秩仍各归原衙门，因此在人数上也没有固定的限制。南书房翰林一般是保持两名左右，但有时因内廷编纂书籍，或发现了特殊人才，也往往临时添派人员。如：康熙十六年清圣祖初设南书房时，其入值人员只有张英、高士奇；翌年闰三月，因编辑书籍需要，增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王士禛至南书房；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又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侍内廷；同年八月初六日，又有“召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学士张英、内閣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励杜讷同观狮子”的记载^⑨。可见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同时在南书房入值者，至少有五至六

人。按《清史稿·沈荃传》所载，似乎在此期间，沈荃亦应在南书房入值，但无论《南书房记注》或《康熙起居注》都未见有此记载。从《康熙起居注》中可知，上述南书房翰林中，似乎还有经常入值与临时入值的区别。如张英、高士奇二人，显然是经常入值、朝夕供奉的南书房翰林，他们赐居禁城之内，过着“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谨恪”^⑩的紧张不安的天子侍臣生活。关于励杜讷的入值南书房始末，缺乏详细记载，南书房设立之初他并未入值是可以肯定的，至康熙十七年八月的“起居注”及《南书房记注》才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但从其中的记载来看，他似乎亦是经常入值的人员。而陈廷敬、王士禛则似属临时入值性质，清圣祖因编书需要，临时召入，书成则退，再编则再召。如《康熙起居注》内载，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是日，上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王士禛至南书房，同侍讲学士、支正四品俸张英，内阁撰文中书舍人、支正六品俸高士奇编辑”。数月以后，即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又载：“是日，上召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于南书房编纂”。《南书房记注》内所载亦同。陈廷敬在数月之内两次被召入南书房编辑或编纂，至少说明他在闰三月的第一次入召，是具有临时性质的，编完即退，故才有是年七月的第二次入召编纂，并且自此以后，他才成为经常入值南书房的翰林。陈廷敬的第一次入召是如此，与他同时入召的王士禛似亦应如此。另如《香祖笔记》内载，有一次清圣祖赏赐南书房翰林人各松花小砚一方，而大学士张玉书及工部尚书王鸿绪也得此赏，因为“时十一月，偶召张及王入南书房编次御书得赐”云云^⑪。则张、王二人当时也属于临时性入召之例，只不过王鸿绪以前曾任过南书房翰林，康熙三十八年授工部尚书后，经常在内编纂，后来似乎仍值南书房。此外，除了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入值官员外，在康熙中叶以后，南书房还有一些入内轮值的翰詹官员。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五月,圣祖谕礼部尚书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曰:“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向因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语举止。近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直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②。康熙四十七年停止轮值,康熙五十三年又恢复四人轮值,与南书房翰林一处行走,五日一更换③。

三

南书房既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或内廷的机构,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成文的职掌规定。按清圣祖设立南书房时的谕旨,主要是因为他退朝后在宫内“观书写字”时无人可以咨询应对,因此召文学词臣“常侍左右,讲究文义”。由此可知南书房的主要职掌是为皇帝读书治学充当咨询和顾问。根据康熙朝《南书房记注》及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康熙时期南书房翰林的具体任务和作用,归纳起来约有四项:

第一,为皇帝讲解经史,或在皇帝研究经史精义时提供咨询。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之间在穷经论史之余,有时亦会涉及治道的探求和政事的垂询奏对。如《南书房记注》载:康熙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辰时,“上召臣英至懋勤殿,上复诵‘太康尸位’五节,亲讲‘其二曰训有之’四节。上曰:‘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礼记》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终皆言敬慎。大抵诚与敬,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臣英对曰:‘诚与敬相因,而诚又为敬之本。此心纯然不杂,则常能主敬,稍有二三,则怠忽乘之。圣言真得其要领矣。’上因论峻宇雕墙曰:‘古人谏象箸、玉杯,亦是此意。萧何治未央宫,以壮丽为威重,先儒讥之当矣。’臣英对曰:‘大凡嗜好,当防其渐,恐启人窥伺之端。所以象箸必谏,

虑其渐也。萧何反以宫室壮丽启之，难语于大臣之职矣。’上因论人材器使之道，臣英对曰：‘材有所长，则必有所短。古人云，人不求备，但当于各取所长之中，又观其本末轻重耳’。上曰：‘今人沿于明季陋习，积渐日深，情操洁己，难言之矣。职守亦多至旷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即为丛弊之地。朕常欲化导转移，每患积习难去。’臣英对曰：‘人心风俗，乃国家根本，但习染既非一朝，则转移亦自不易。惟在我皇上事事常用鼓舞之法，以潜移默化之，则人心自能丕变。臣尝闻古人有言：人君之心与斗杓相似，一东指，则天下煦然而春；一西指，则天下肃然而秋。发之者只在几微，应之者捷如影响。今使天下之人，皆晓然于皇上意指之所在，争趋而应之，予以转移，天下如风行海流，虽积习不足为虑也’”。又如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一日《南书房记注》载：“辰时，上召臣英至懋勤殿，上复诵《大壮》全篇。讲毕，上曰：‘塘报至，知正月间大兵从黔中进者，已渡铁索桥，去滇省仅六百里。从广西进者，道里亦如之。此两路兵皆无贼兵抗拒，盖贼众皆在四川边界。此时蜀中大兵临压，势必不能反顾。诸路军捣虚直入，此真腹背受敌，首尾交困之时也。’臣英对曰：‘逆贼大势已溃，地险全失，断难支吾旦夕。大兵仰仗天威，真如摧枯拉朽，荡平捷音，即在指日间矣。’”这就是南书房翰林为皇帝讲解经史，探求精义的一般情况，主要是作学术上的探求，偶尔涉及治道及现实政事，也大多是从宏观方面作些议论和判断，不作具体政务的处理。这种讲论经史的活动十分频繁，从《南书房记注》的记载来看，在南书房设立的最初四、五年内，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辰时或巳时），而且有时每日两次（辰时、未时），其活动地点，主要是在乾清宫懋勤殿内。

第二，为皇帝编纂书籍。清代的一些皇帝，喜好召集文人编纂书籍，这也是由来已久。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设文馆，

命达海等翻译经史，编纂国史。清世祖福临入关后，又议修《明史》，诏求遗书，并敕撰《易经通注》、《孝经注》等书。清圣祖玄烨更是经史百家乃至西洋科学，无不爱好，研读之余，手编敕纂了各类书籍，诸如《律吕正义》、《历象考成》、《数理精英》、《周易折中》、《日讲书经解义》、《佩文韵府》、《图书集成》、《古文渊鉴》、《明史》等不下二三十种。其中就有不少是南书房翰林们奉敕编纂的。如叶方蔼在南书房时充任《鉴古辑览》及《皇舆表》总裁官；胡煦入值南书房时，参加了《周易折中》的编纂；魏廷珍在南书房时与王兰生、梅穀成同校《乐律渊源》。徐乾学入值南书房之后，更是“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②，曾充《大清会典》、《一统志》的副总裁，并奉敕编纂《古文渊鉴》。何焯入值南书房时仍兼武英殿编修。所谓清圣祖御撰的《律吕正义》，实际上是南书房翰林王兰生、戴梓帮助编纂的；而同是清圣祖御纂或御撰的《历象考成》及《数理精英》等书，也是南书房翰林梅穀成帮助编成的。清圣祖常在內廷之蒙养斋设局修书，其地与南书房相近，有些南书房翰林往往兼充书局之编纂各职。故当时的起居注官有：“又时召儒臣入南书房，凡古人文辞，有关治理者，编纂成帙，充溢几案。从来右文响学之盛，至斯而极矣”的感叹^③。

第三，在皇帝万机之余，陪侍他作文化方面的消遣娱乐，或诗赋唱和，或书法临摹，或古画鉴赏，乃至钓鱼赏花、侍宴伴游等等。清圣祖自称：“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④。《郎潜纪闻》内也言：“圣祖自言，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咯血不肯休。几余游艺，临摹名大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云云^⑤。所以清圣祖在退朝之后，常召南书房翰林或精于书画的朝臣陪侍，以便于研讨观摩。如康熙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南书房记注》内载：“巳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正临摹草书，臣士奇得侍观宸翰，因奏曰：‘皇上运笔圆劲纵横，深得

古人之意’。上曰：‘朕朝夕临摹，常恐未合古法耳’。”又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载：“午时，上赐观内府珍藏王羲之真迹三轴，怀素真迹二轴，颜真卿真迹二轴，苏轼真迹二轴，蔡襄真迹一轴，黄庭坚真迹一轴，米芾真迹一轴，朱熹真迹一轴，赵孟頫真迹二轴，周文矩画董其昌字共一轴，宋初拓《淳化阁帖》全部。臣等恭睹天府希世之宝，满目琳琅，见所罕见，真千载之奇遇也。”又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载：“午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临摹王羲之《乐毅论》小楷，臣士奇奏曰：‘昔人论书，谓右军《乐毅论》有端正士之慨。今皇上临摹，备得其神采，非寻常摹仿形似者所可及也’。”又康熙十七年五月初一日申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侍上书‘五台圣境’四大字。落笔苍劲，结构严密，真足藏之名山，昭垂不朽”^②。如此内行的评论，如此高明的吹捧，足使清圣祖的几暇生活丰富多采，龙颜欢畅。由于他的喜好书法，一时以书法知名而进入南书房的颇有其人，除高士奇外，如前述沈荃、沈宗敬父子，励杜讷、陈元龙、何焯、蒋廷锡等皆是。尤其是沈荃，他以书法著名海内三十年，深得清圣祖的宠遇，“公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上愈嘉其忠益”^③。当时“两宫殿廷屏幛以及御座箴铭，皆属公书。自元公钜卿碑版之文，下至遐陬荒徼琳宫梵宇，争得公书以为荣”^④。以至在沈荃死后，其子沈宗敬入值南书房时，清圣祖仍对大学士李光地说：“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⑤。陈元龙也工于书法，为清圣祖所赏识，曾命其在御前作书，深受奖许。何焯精于楷书，其所手书，时人争为传宝。蒋廷锡工写生，书法亦精，后来的鉴赏家都称他的别号曰南沙^⑥。可见陪侍皇帝作书练字，亦是南书房翰林的主要任务之一。至于诗赋唱和，更是南书房翰林们的经常课题。或是皇帝几暇之作，要词臣们颂扬唱和；或因有事，或因节日，皇帝要他们作诗应制以言盛记胜；或皇帝披阅古人诗赋，与他们讲论心得。

如《南书房记注》内载：“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一元旦，上召臣英、臣士奇于养心殿侍宴，各恭纪七言律诗应制。十五日赐宴于南书房，各恭纪五言律诗应制。十六日臣英、臣士奇观鳌山灯于养心殿，各赋七言律诗二章，进呈御览。二十三日，上以御制诗十章赐观，臣英、臣士奇谨奏曰：‘臣等恭睹皇上圣制，命意高超，修词宏丽，有包罗八荒，函盖一世之象，不独诗法精工，度越今古也’。因恭纪七言诗四首，进呈御览。……二十九日未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阅唐诗”。诸如此类记载，在康熙朝《南书房记注》内不胜枚举。作诗或品评诗赋，亦是清圣祖的一大爱好，他个人作品甚多，因此在当时的南书房翰林中，因擅长诗赋而应选者也颇不乏人。如王士禛、查慎行、钱名世、杜诏、贾国维等皆是。

第四，为皇帝整理，誊抄甚至代写一些文字资料或撰拟一些特颁谕旨等。清人何刚德的《春明梦录》内有这样一段话：“大抵御制诗文集，或由儒臣润色，或代拟之。万几鲜暇，不能一一躬亲，亦如上赏之福寿字联匾，多由南书房恭代，不尽是御笔也”^⑧。这虽是记的乾隆年间之事，但康熙时之南书房，也未尝无此类情况。至少从清圣祖于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十日给南书房翰林高士奇的一道手敕中，可以知道高士奇曾经为他整理或书写过一些手稿和谕旨。其手敕说：“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实为可嘉。特赐表里十匹，银百两以旌尔之勤劳。特谕。”^⑨至于野史所载有关高士奇为清圣祖代拟翰墨之类更不乏其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清圣祖首次南巡，当在京口龙祥寺游览时，寺僧求赐题匾，清圣祖一时未能思及所题内容，时高士奇在侧，及时送上一纸，上书“江天一览”四字，清圣祖遂照此挥毫。后至苏州游狮子林并赐题匾额，清圣祖原拟题“真有趣”，经高士奇建议后题为“真趣”。康熙二十八年清圣祖第二次南巡，至杭州游灵隐寺，寺僧跪求赐题